

# 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谱系建构与 乡村价值发现

段友文

**【摘要】**山陕豫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中国社会现代化总体格局中占有特殊地位,对黄河流域各省区乃至其他省区的发展应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系统深入地整理民间文化资源,建构文化资源谱系,有利于彰显乡村社会的内源性动力,走出一条具有本土化的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民间文化资源谱系主要涵盖民间文献资源、物质生产生活资源、民间组织资源、信仰庙会资源、民间文艺资源五个系列。只有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探索民间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模式,推进“山陕豫跨省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立,才能讲好黄河故事,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的宏伟蓝图。

**【关键词】**山陕豫;实证研究;民间文化资源谱系;创新性发展

**【作者简介】**段友文(1957-),男,山西襄汾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要从事民俗学与区域文化研究(山西 太原 030006)。

**【原文出处】**《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太原),2021.2.20~3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谱系与创新性发展的实证研究”(19ZDA185)。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和魂,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积淀深厚,是新时代增强文化自信、建设美丽乡村的内源性动力,对乡村文化复兴、厚植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本土特色具有重大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2018年新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确立了“三农”发展新的历史定位,规划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路线图和时间表。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河南考察之后,发表了《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家战略。”<sup>[1]</sup>把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提到了新的高度,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指南。山陕豫三省地处黄河中游,自古以来地理毗邻、习俗相近、人缘相亲,植根于农耕文化土壤的民间文化资源有着极强的同质性,在乡村振兴和黄河流域

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抓住历史性机遇,深入挖掘民间文化资源,建构民间文化资源谱系,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古老的民间文化资源焕发出新的活力,实现乡土文明的价值重构,这是山陕豫三省必须破解的时代性难题。我们的设想是,乡村振兴旨在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这些突出的社会矛盾,以补齐民族复兴之短板,夯实社会现代化的基础;乡村振兴必须突出农民主体地位,充分肯定乡村民间文化的现代价值,既不能机械复制城市化的路径,也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现代化的老方法。为此,必须直视中国乡土大地,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乡村重建的本土化道路。民间文化资源是数千年农耕文明的产物,是中华文明繁衍发展、薪火相传的重要依托,它渗透弥漫于乡村社会物质生产、民间组织、乡村治理、信仰观念、文艺审美的方方面面,但是由于它具有极强的生活属性,感性散漫,使得人们对它习焉不察。今天站在新农村建设的高度,以文化整体观的宏阔视野,深入系统地发现整理

民间文化资源,是重要的、艰巨的任务。在此基础上,探索民间文化资源内部发展逻辑,揭集不同类型民间文化的深层关联,这成为民间文化谱系建构的应有之义。民间文化资源谱系建构的终极目标还要发现捕捉不同的民间文化类型、系统所对应的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劳作方式、社会制度、心意信仰、审美情趣,把民间文化置放在社会运行的大系统中综合考量,总结民间文化与地方社会互动互构的规律,促进乡村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要实现这一研究目标,学术上要实现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的交叉研究,多学科渗透融合;地域上要打破固有的行政区划壁垒,由山陕豫学术团体、管理部门、民间组织,更重要的是动员广大的乡村民众共同参与,建立“山陕豫跨省域社会文化共同体”。只有准确把握时代的难题并作出深刻而有说服力的解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发掘民间文化资源的现代价值,才能共同讲好“黄河故事”,奏响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黄河大合唱”。

### 一、从民间文化资源中寻求乡村振兴的内源性动力

发掘整理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实现从资源到资本的转换,一方面必须遵循“乡土的逻辑”,站在农民“主位”立场,怀着对乡村文化的深切认同,从“乡土中国”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进入,探寻民间文化蕴涵的地方性知识与民众的生存智慧,洞悉民间文化代代相传的生命密码;另一方面站在经济全球化、社会现代化的时代制高点上,重新审视以民间文化为核心的乡村文化,形成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对接融通,让民间文化资源在乡村振兴的伟大社会实践中彰显磅礴的力量。

####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民间文化资源谱系建构的三重逻辑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也是中华民族经历百年沧桑巨变做出的必然选择,党的十九大报告为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二十个字总要求,描绘出未来美丽乡村建设的宏伟蓝图。我们认为,要实现乡村振兴的百年梦想,必须牢记乡村是民间文化的发源地,实现传统的民间文化与社会现

代化的对接融汇,这是出发点;用民间文化搭建城乡融合发展的桥梁,激发城乡居民的“乡愁”,建立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这是聚焦点;在保持乡村民间文化底色的基础上,实现民间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盘活民间文化资源,这是落脚点。

1. 传统与现代的价值性互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精准概括。乡土社会是建立在以血缘、地缘基础上的宗法制社会,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生存,人们以家庭为基本社会单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秋收,形成了特有的农耕生产习俗;为了共同应对来自自然的、人为的各种灾难,他们必须相互帮扶,结成以家族村落为中心的社会组织。从古老的“春祈秋报”到后世的二十四节气,再到丰富多彩的岁时节日民俗,都是人们源于对土地、山川、河流、天神的自然崇拜而形成的民俗信仰与观念仪式。农耕文化孕育了星罗棋布、广袤浩繁的家族村落,也孕育了乡村百姓的生活习俗,恋土重农、耕读传家、重视乡情、务实守成是区别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上层文化的“乡土逻辑”。自1978年以来,农村经历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快速的城镇化,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革,乡土文化受到猛烈冲击,形成新的转型,其主要表现为:一是由封闭同质的农耕文化转向多元异质文化。由于土地承包、户籍放宽、城乡互动,农民获得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接受了商业文化、城市文化、外来文化,使固有的单一农业文化有了开放性、多元性。二是由生存理性转向经济理性。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里,农民以首属群体为依托,在人多地少的压力下辛勤耕耘,守望相助,凭借低下落后的生产力抵御各种困难,维持生计,只要活得下去就会“安土重迁”,即使远走他乡,最后也要落叶归根。随着市场化、商业化的发展,农民在满足基本生存条件之后有了更高层次的需求,寻求更好的发展空间,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三是从伦理本位转向利益本位。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家庭之内敬老孝亲,邻里之间重情尚义,尤其看重人情与面子。现代社会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农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农民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行为动机的重心发生位移,个人利益成为权衡人际关系的主要砝码<sup>[2]</sup>。传统与现代并

非水火不容,而是互为镜鉴,相互结合的,关键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文化调适,以代代相沿、薪火相传的农耕文化为根本,以现代社会新的理念为参照,实现“历史之根”与“现代之源”的成功嫁接<sup>[1]</sup>,彰显传统乡村文化的价值与活力。

2. 城市与乡村的战略性耦合。城市化是西方国家衡量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主要包括城市人口数量和工业化水平两个方面。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城镇人口仅占17.9%,到2016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剧增到57.35%,预计2021年将会超过60%。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对农村农业乃至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大,发达的城市需要发达的农村的强有力的支持,城市与乡村的融合发展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工业化是对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水平的总体评价,其内涵主要是制造业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从事制造业人口数量、制造业技术水平、城镇化率的提升以及人均收入状况<sup>[4]</sup>。工业化发展大体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城乡关系具有不同的情形。初期阶段,工业基础薄弱,主要是农业支持工业;中期阶段,工业化体系基本形成,工业开始反哺农业;后期阶段,农业自我积累能力增强,工业与农业差距缩小,进而融合发展。我国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至2000年之前长达半个世纪的农业对工业的支持,进入21世纪之后总体达到了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社会进入新时代,“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这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突出反映在农业和乡村发展的滞后上。”<sup>[5]</sup>因此,当下主要的任务是打破长期以来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实现工业反哺农业,通过乡村的城镇化,形成城市与乡村的协调发展。打破城乡壁垒,建立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的桥梁就是挖掘乡村民间文化资源,保留乡村记忆,以“乡愁”为纽带,达成城乡居民的文化认同。在乡愁的召唤中让乡村民众能够守望家园,使城镇居民“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聚焦城镇化,留住乡愁,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这是中国乡村振兴实现本土化的必由之路。

3. 固本与创新的实践性转换。乡村是农民赖以

生存发展的重要场域,千百年来她不仅孕育了传统的农耕文明、生产生活方式,也延续着与之关联的社会制度、精神文化,有着无比丰富的内涵。乡村的功能主要是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为城乡居民提供重要的农产品,同时为整个国家尤其是城乡结合部的城镇提供生态屏障、营造绿色环境、提供绿色产品。更为重要的是这里保存着特色鲜明的“地方性知识”,是民间智慧的宝库,对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挖掘发现民间文化资源,就是要保护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挥民间文化资源在当代乡村振兴中的重要功能,因此,既不能封闭保守,故步自封,仅仅停留在对乡村田园生活的向往,对后现代社会的迷恋中,也不能激进急躁,盲目随从,照搬城市化模式或模仿西方。我们要通过对民间文化资源的整理,发现乡村社会蕴含的物质、制度、知识、理念等更深层次的东西,延续历史文脉,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民族精神,这是研究民间文化的落脚点,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目标。具体来说,就是在摸清楚黄河流域山陕豫民间文化家底的基础上,建构民间文化资源谱系,依据民间文化资源不同类型的性质、特征、功能来分类施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彰显民间文化凝聚的内生力量,让乡村充满新的生命力。

(二)一河跨三边:从“黄河金三角”到“山陕豫跨省域社会文化共同体”

黄河是一条自然的河流,更是文化的河流,千百年来奔腾不息,孕育了闻名世界的华夏文明。2014年4月国务院批准建立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经济发展区,包括山西省运城市、临汾市,河南省三门峡市,陕西省渭南市,是促进跨省合作,实现中部崛起的重大举措。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黄河沿线九省区的协作发展描绘出宏伟的蓝图。经济要发展,文化需跟进,文化作为软实力将为山陕豫协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如何由黄河金三角扩展到黄河中游山陕豫三个省区,对整个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起到示范引领作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挑战。以民间文化资源为依托,建立山陕豫跨省域社会文化共同体是势在必行的历史选择。

## 1. 黄河流域山陕豫社会文化的同质性

山陕豫三省区作为中华文明核心地区,其地理环境、社会历史、习俗风尚乃至文化心理结构都有着极大的相似性,这是三省区民众实现文化认同、共筑社会文化共同体的重要基础。传统文化的发生、发展及其地理格局的形成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历史发展、族群迁徙分布、行政区域沿革等多种文化因素的驱动,区域文化的研究,不仅要关注行政区域,更重要的是要考察自然区域、文化区域,从历史、文化、地理的角度总结文化发展演变规律,进而为当代文化的发展提供参照。文化区是指处于同一地域范围或地域相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受各种文化因子的驱动而形成的具有类似文化特质的区域。山陕豫三省同处黄河中游地区,得到黄河水的滋养,创造了无比丰富的传统文化,其文化的同质性不仅体现在神话传说、农耕文化、民间文艺这些标志性文化事象上,而且有“秦晋之好”“大槐树移民”“山陕会馆”等重大文化事件及文化建筑作为佐证。古老的神话传说是华夏民族形成发展的见证,保留着珍贵的历史记忆。以黄帝、炎帝、蚩尤三个部族为代表的诸多部族在这里经过冲突、融合,建立了华夏民族,大禹治水在陕西韩城,山西河津,河南登封、禹州形成了独特的“大禹神话传说圈”,尧、舜、禹、成汤等帝王传说家喻户晓,至今保留着相关的文化遗迹与口承文本。黄河中游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适合人类定居,华夏先民最早在这里创造了农耕文明,后稷教民稼穡的神话传说在陕西武功、岐山,山西稷山、万荣等地广泛流传。山陕豫乡村民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历朝历代都有各类农书、农谚,农村生产生活的有机循环为现代新农村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民居是适应定居的农耕生活而形成的居住类型,山区的土窑洞、平川的四合院,还有山西平陆、河南陕县、陕西三原的地窖院,都是乡村民众依据自然环境选择的宜居方式。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催生了二十四节气和丰富多彩的岁时节日民俗,伴随着春祈秋报等农事仪式,山陕豫各地盛行求雨仪式、迎神赛社活动。戏曲上演是乡村民众节日狂欢的重要内容,山陕豫都有“戏曲之乡”的美誉。植根于农耕文化土壤上的自

然生态资源、生产生活资源、文化艺术资源构成了农村的“财富三角形”<sup>①</sup>,有不可替代的应用价值。黄河形成了山陕豫三省天然的区域隔离,也带来了三省从官方到民间的密切交往。大河做媒,成就了“秦晋之好”的佳话,公元前655年秦穆公派大臣携重礼请求迎娶晋献公的女儿伯姬,两国国君出于安定国土、以图称霸的政治需求,达成了政治联姻,开始了秦国和晋国的友好往来,地处陕西渭北旱塬澄城的水莲古村就是“秦晋之好”的发生地,至今遗迹尚存。明清时期,山西、陕西商人因地域毗邻、习俗相同、性情相近,密切合作,经商的足迹遍及内蒙古、河南、河北、湖北、四川等二十多个省区,山陕会馆遍布全国各地,仅河南省就有社旗山陕会馆、开封山陕会馆、洛阳山陕会馆、郟县山陕会馆等。正如清人李云栋的《成都竹枝词》所云:“放账三分利逼催,老西老陕气如雷。城乡字号盈千万,日见佗银向北回。”“老西”是山西人,“老陕”指陕西人,这首竹枝词描述了清代山陕商人在成都的商业势力,财源滚滚,大量的财富运回了北方老家。山陕商人以历史英雄关羽为财神和保护神,强化了共同的地域文化心理,在与其他地域、其他商业群体的激烈竞争中称雄八方。明代初年的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运动,使大量的山西人远走他乡,到河南、河北、陕西、山东、湖北各地安家落户,在河南、陕西许多村落的家族谱牒上都记载着祖先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作为明代移民的迁出地俨然成为家族祖先崇拜的象征符号,它是超越一般地域文化心理的更为深刻的族群心理,使山陕豫乡村民众内心深处凝聚着一种“山西是故乡”“我们是老乡”的文化认同。山陕豫乡村民众以洪洞大槐树为标志的祖先认同,突出地表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山东、河北等地遭受黄河泛滥、旱灾水灾等天灾人祸的巨大灾难之后,他们逃荒避难的首选之地就是山西,形成了汾河流域的边远山区地带成片的“河南村”“山东村”这样的村落景观。“秦晋之好”“大槐树移民”“山陕商帮”等“文化事件”成为山陕豫民众跨省域合作的情感纽带,为新时代山陕豫跨省域协同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文化心理基础。

## 2. 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的区域分异

同质性与分异性是区域文化的一体两面。区域

分异是指文化现象在不同地区间的表现形式,这种文化的差异性是由于自然地理、民族迁徙、风俗习惯、方言土语、心意信仰等文化因子交互作用、共同驱动之下形成的。因此,山陕豫三省有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亚区与形态各异的文化类型,这些文化亚区有的与行政区划重合,大多数情况下则是以自然地理分割、习俗惯制传承、方言土语扩布为地理边界的。从省级行政区划来看,山西可分为晋北、晋中、晋南、晋西、晋东南五个文化亚区;陕西包括陕北、关中、陕南三个文化亚区;河南则有豫北、豫西、豫南、豫东等文化亚区。从山陕豫跨区域社会文化共同体考察,以三省交会的黄河金三角为核心区,以黄河中游渭河、汾河、伊河、洛河、沁河等支流连贯的地区为中心区域,以各省与周边省区交汇地带为边缘区域,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文化类型。黄河金三角核心区域民间文化资源包括神话传说资源、农耕文化资源、历史文化资源、表演文化资源等,类型众多,门类齐全。陕北、晋西同属晋语方言区,道教信仰盛行,伞头秧歌、民歌戏曲、三弦说书深受乡村民众喜爱。明清以来山陕大峡谷的水上交通运输成为贯通山西、陕西、内蒙古各省区经济交往的重要通道,黄河左右岸的山西碛口镇、陕西木头峪都是秦晋两地的水陆码头。随着社会的变迁,水陆码头的功能消失了,然而这些古村落、古名镇保留的商铺、街道、院落、窑洞、神庙、戏台仍然述说着昔日的繁华,成为开展乡村旅游的独特文化景观。太行山崇山峻岭,逶迤连绵,河流纵横,横贯连缀着山西、河北、河南三省,历史上划分为北太行、西太行、南太行,这里不仅有女娲补天、炎帝神农、精卫填海、后羿射日、愚公移山等经典神话传说,而且依托奇特壮观的自然地理形成了山区村落景观。山西境内的抱犊村、井底村、黄崖底村,河南境内豫西林州石板岩村、辉县郭亮村,这些村落景观将自然风景与人文创造相结合,融雄、壮、奇、险、秀多种审美范畴为一体,被人们称为世外桃源。总之,山陕豫跨区域社会文化的同质性,是实现文化认同的基础;区域文化的分异展现的是文化的多样性与包容性,彰显了黄河流域山陕豫民间文化的博大精深。将同质性与分异性综合考量有利于构建同为主导、同中有异、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山

陕豫跨省域社会文化共同体。

### 3. 建立“山陕豫跨省域社会文化共同体”之构想

黄河流域横贯全国九省区,地域广阔,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样貌,上游为水源涵养地区,重在生态修复;中游在防止水土流失,加强污染治理的同时,目标是实现经济、文化的“中部崛起”;下游是河流湿地和生物栖息地,要在修复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位于黄河中游的山陕豫三省不仅是一个生态共同体,也是一个经济共同体,更是一个“跨省域的社会文化共同体”。目前黄河流域各省区都在讨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省域方案,为国家的顶层设计做准备,我们发现存在偏重生态保护、水沙治理、产业发展,对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估计不足的现象。共同体首先是有共同的命运,它昭示着特定区域群体的生存、发展和完善的生命历程。在这个共同体里,每一个人类个体都会有共同的感受与意识,对群体的生存与未来发展达成普遍的意识,这就是康德(Immanuel Kant)所说的人与人之间的建立在一致性、普遍性基础上的共同感,也是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所说的可以把个人与他人、族群、民族联结成一个整体的共同意识<sup>[7]</sup>。共同体理论的奠基者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认为,共同体的基本形式有三种,即源于亲属关系的血缘共同体、源于邻里关系的地缘共同体和源于宗教、友谊或同志式精神关系的精神共同体<sup>[8]</sup>。山陕豫社会文化共同体涵盖了这三种形式,是以家族为细胞、以村落为基本社会单元,推而广之,将不同的社区、文化亚区维系在一起的超大社会群体。社会文化共同体,从文化的视角看,关注的是乡村社会以农民为主体的感性生活与情感生活,以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身体性、情感性感受为标准,关注广大民众的生存命运和日常生活,充分发挥民间文化资源的内源性动力,建设美丽乡村;从社会运行的整体机制考察,注重民间文化传统中积淀的生态观念、生存法则、生产经验、村落规范,并与当代社会的生态建设、经济发展、文化延续建立起内在的关联,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的各个要素及检测指标形成系统性、协同性、整体性的良性运行机制。山陕豫跨省域

社会文化共同体有优越的地理生态资源、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宝贵经验,理应成为在黄河流域率先发展的“主体功能区”“示范引领区”。

## 二、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谱系建构的内在机制

民间文化是中华民族根基性文化,是优秀传统文化中耀眼的风景。她是植根于农耕文化土壤上由历代民众群体创造、传承、享用的生活文化,主要包括民俗文化、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深刻地反映出人民朴素的生活理想和审美认知。在乡村振兴的伟大社会实践中,要重估乡村民间文化价值,增强农村自我“造血”功能,在先进价值观引领下建构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谱系,这是乡村振兴的社会底盘。

### (一)重新发现乡村民间文化资源的价值

民间文化很早就受到学界的关注,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歌谣学运动,19世纪30年代中山大学民俗学运动,文艺大众化运动,19世纪40年代延安民间文艺运动,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眼光向下”的民间文化研究热潮,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以神圣的历史使命感和崇高的学术责任感从事民间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钟敬文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民间文化”这个术语<sup>[9]</sup>,用一生的努力为民间文化学的建立奔走呼号,孜孜以求,为民间文化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改革开放40年来,在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学人们在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碰撞交融中,认识到了守护家园、传承民间文化的重要性,在民间文化的各个分支学科取得了显著成绩。杨民康《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sup>①</sup>、路应昆《中国戏曲与社会诸色》<sup>②</sup>从民歌、戏曲与乡土社会的关系来揭示民间艺术的乡土底色,彰显其功能和价值。张士闪《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鲁中四村考察》<sup>③</sup>将乡民艺术置放在乡村的特殊语境中考察,为村落型民间艺术表演系统的研究提供了成功个案。季中扬《民间艺术的审美经验研究》<sup>④</sup>、强东红《陕北民歌的审美维度与文化价值研究》<sup>⑤</sup>,或从宏观的民间艺术整体入手,或从民间艺术单个体裁着眼,试图总结民间艺术区别于经典艺术的独特审美特征与鉴赏规律,为乡土艺术的保护提供了理论根据与实践的可能性。朱启臻《把根留住——基于乡村价值的乡村振兴》<sup>⑥</sup>、潘鲁

生《美在乡村》<sup>⑦</sup>等,他们以充足的乡村文化、乡土艺术调查资料为依据,展示乡土文化无比丰厚的资源,指出乡村作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生活共同体,至今仍然是数亿乡村父老生存发展的家园,是民族乡愁的寄寓地、情感维系之原乡,揭示了村落文化、乡村艺术的存在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考察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但是,从民间文化的学术史考察,学界对民间文化资源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偏向或缺陷,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研究内容上,偏重精英文化,忽略民间文化。传统文化、文化学的研究,重点关注的是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大传统”,民间文化作为广大中下层民众创造的“小传统”发出的声音微弱。二是研究视角上,偏重“自上而下”,忽略“自下而上”。研究区域社会习惯于发号施令、“运动式”推进,忽略了民间社会自身运行规律,没有站在民众“主位”立场上考虑民众的感受与需求。三是研究方法上,偏重个案研究,整体研究欠缺。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多年来习惯于以村落、社区为个案,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之目的,而依据多点调查所做的整体研究或跨区域研究较少。四是学术取向上,偏重理论分析,实证性田野调查实践环节薄弱。受学科背景、学术训练的影响,多数学者习惯于“书斋式”理论研究,而缺乏对民间社会身体力行的体验与领悟,未能从乡村社会现实出发,为民间文化资源的创新发展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路径。上述缺陷对学界乡村民间文化的研究提出了严峻挑战,也为我们在深入田野调查基础上,挖掘民间文化资源,建构文化谱系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 (二)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谱系生成的四个维度

“谱系学”概念重在强调事物之间的同源性、连续性和一致性。学界所谓谱系学,又译作“系谱学”,其源头要追溯至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尽管尼采没有给“谱系”一词做界定,但是他认为所谓的价值、观念、真理这些形而上的概念都是人为建构而成,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揭示了权力、政治对现代道德形成的作用,建构了“道德谱系”话语<sup>[10]</sup>。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尼采研究的基础上将

谱系学发展得更完善,他的学术贡献,一是在从考古学向谱系学的转向过程中,强调“社会制度”对话语的影响,倡导谱系学;二是对传统历史学认定的历史连续性、客观性、一致性的观念提出质疑。他拒绝寻求起源,指出传统历史学在形而上观念指引下,认为历史是线性的、不断向前发展,过去对现在总是积极地发挥作用,这种观念并不完全符合事物发展的真实情形。因此,他倡导反对历史的统一性,追寻现象与偶然,在历史的细枝末节和琐碎的事物中去发现与起源不一致的东西<sup>[1]</sup>。福柯的否定历史连续性的观点虽有偏颇,但是他强调关注历史发展的“细枝末节”的倡导,对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的挖掘具有实际借鉴意义。21世纪西方谱系学理论引进中国,在哲学、历史学、文艺学各学科领域引起热议<sup>②</sup>,民俗学界的讨论以田兆元、林继富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田兆元发表了系列性的以民俗谱系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他认为谱系是认识文化内部整体性、互动性的重要方法,并提出了“民俗谱系四维说”:具有共同习俗与文化价值观的族群谱系、民俗生成与传播的空间谱系、历史维度的民俗文化生成的时间谱系、修辞学与叙事学维度的民俗自身的形式谱系。林继富在《解释民俗学》<sup>③</sup>一书以及《民俗谱系解释学论纲》等论文中,试图在反思民俗解释理论的基础之上建立民俗谱系解释学,其内涵包括亲缘谱系、姻缘谱系、地缘关系、族缘关系、乡邻关系和语言谱系等涵盖民俗生成的土壤和流传的范围<sup>[2]</sup>。由此可见,作为方法论的谱系学,其研究的旨趣在于从整体的视野、以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搭建起研究对象历时态与共时态的关系网络,首先要求勾勒出研究对象内部的主要内容即各个子系统,对研究对象谱系内部各文化因子的关联性进行分析,然后探索该谱系与整个社会运行机制里各文化要素的关系,洞悉民间文化资源与民俗生活、乡村社会互构共生的鲜活灵动的生命运行轨迹。

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谱系生成应把握文化地理、文化时空、文化结构、文化认同四个维度。

### 1. 资源与交通:文化地理的维度

“地理环境,包括宇宙的、地质的、气象的、水文的、人文的、生物的等条件,它们共同构成人类生存

的基础,创造文化的自然前提。”<sup>[3]</sup>自然地理环境是文化生成的客观条件,经由物质生产及其技术系统这一中介促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与文化的创造。丹纳认为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指出前者是构成精神文化的巨大的外动力,而后者主要是民族的、种族的环境,构成文化发生的永久性的内动力<sup>[4]</sup>。资源、交通是影响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的地域格局与结构特征的主要地理要素。资源因素对山陕豫民间文化形成发展最具影响力的是水利资源,由于山陕豫大部分地区属于干旱、半干旱的农耕区,水资源相对匮乏,制约着民众的生产生活,甚至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地域文化模式。由于水资源短缺,形成了纷繁复杂的水权之争,影响着村际、地域之间的关系,由此产生了治水、管水的水利组织。同时,与水相关的水神庙宇、水神信仰、求雨习俗随之产生,大量的神庙碑刻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交通因素主要体现在发达的水路、陆路系统对民间文化的传播作用上,其例证颇多:一是山陕峡谷的黄河水旱码头,沟通了黄河左右岸晋西、陕北各县的联系,形成了晋陕蒙经济贸易圈,带动了黄河沿线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二是古河东与关中地区以黄河及其支流汾河、渭河为通道形成的河运、桥梁,极大地便利了山陕豫三地的经济往来,水路、陆路交通运输民俗构成了民间文化的雄奇乐章;三是交通与移民文化,明代大槐树移民,20世纪30-40年代河南遭受水灾旱灾之后逃难的民众,晋豫交通要道成为移民迁徙的主要路线,祖籍地与迁入地的往来互动,促进了不同地域间文化认同与涵化;四是商路与戏路的耦合,明清时期山陕商帮的商业活动,以山陕梆子为艺术源头的各种地方戏曲迅即传播开来,形成“商路即戏路,有西商的地方就有梆子戏”的盛况。

### 2. 历史与场域:文化时空的维度

民间文化资源是在特定时空中形成的,只有在时空系统中才能真正把握文化发展的脉络与趋向。时间是考察文化发生发展的结构形式,呈现的是文化演进的顺序性和持续性;空间是考察文化延续扩布的地理基础,关注的是文化存在范围的广延性和伸张性,时空变化构成了民间文化演变、传承的最基

础的层面。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告诉我们,场域是由时间、空间、参与者多种因素构成的,文化主体在参与文化创造的过程中,既受制于场域,也在建构和改造着场域<sup>[15]</sup>。因此,时空不仅是自然的时空,也是社会的时空,时空社会学正是把时间和空间作为透视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主要视角,以时间和空间作为重要支点,考察在社会变迁中特定时空结构里资源、权力、经济、文化等要素的变化<sup>[16]</sup>。社会时空是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多元的文化场域,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具有完整而严密的时间谱系,时间链条纵贯上古、延续至今,形成了具有完整历史时序的资源类型。以类型丰富的民间文献资源为典型代表,神庙碑刻、家谱族谱、契约文书、民间宝卷、方志史料等皆以时间为序,记录着丰富多彩的乡村社会文化进程。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的空间谱系,以三省交会的黄河金三角为核心圈辐射开来,形成了核心圈、中心圈、延伸圈、边缘圈等文化圈层。同时由于地域文化的分异,又形成了诸多包涵特殊文化特质的文化圈,如神话传说圈、民间信仰圈、移民文化圈、水陆交通运输圈、戏曲传播圈等。因此,文化谱系的分类越细致,就越具有文化个性与地方特色。

### 3. 根源与表象:文化结构谱系

民间文化的结构谱系指文化自身具有的组织性及内在发展的动态结构系统,包括深层结构、转化结构、表层结构。民间文化产生于人和自然、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其内部存在着一个三层级的动态体系。深层结构是民间文化的产生来源及其内在的动力,本质上属于一种关系体系与需求体系的探讨。任何文化资源的产生都反映出一种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且在这种互动关系中产生了人的各方面需求问题。转化结构是将人或社会的需求关系转化为具体对象化的实践,即民众创造民间文化资源的实践环节。这些实践活动大致可分为三类,即物质改造活动、精神文化活动与人群交往活动。山陕豫三省的农业生产民俗、居住交通民俗、家族村落民俗、民间组织民俗,以及围绕春祈秋报、岁时节日形成的迎神赛社、社火表演、戏曲演出等活动,皆源于人类生存发展各项需求而转化成的具体生动的

实践行为,体现出民众之于文化生成的创造意义以及作为创造主体的文化选择标准。表层结构是民间文化资源的形态层,即文化需求层与实践层的最终产物。民间文化资源的表现形式多样,可分为口头形式、文本形式、行为形式、组织形式、景观形式等;也可按内容划分为物质文化形式、社会关系形式、精神文化形式、艺术文化形式等。民间文化的三层结构之间是从抽象到具体、从根源到表象的逐渐递进关系。

### 4. 主动与被动:文化认同谱系

文化认同指人类出于某种需求或本性对文化产生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核心要素,通常以群体形式呈现。在山陕豫区域空间内部,对于不同的文化类型,群体认同度的高低也不尽相同。居于认同度的顶层则为高度认同,又可视为主观认同;中间层为选择认同,又称互动认同;底层为模糊认同,又称被动认同。神话传说资源处于认同序列的顶层,是认同度最高的资源类型。原因在于神话作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源头,具有全民族文化认同的意义,更加易于跨越文化和地域的界限而得到广泛传播。民间艺术资源处于认同序列的中间层,认同度仅次于神话传说。究其原因,首先在于现代传播媒介的发达,形成了一个共享的文艺发展空间,使民间艺术资源在原生地与传承地之间广泛交流、融合互动,逐渐缩小了差异性,增强了认同感。其次在于民众审美需求的提高,视野更加开阔多元,更易于接受新的文化事物且产生情感的共鸣。例如,河南马街说书、陕北说书与山西太行说书,虽然产生地域不同,但由于说书自身的多元性、民众对说书艺术的喜闻乐见以及现代媒介的大力推广,有力地缩小了曲艺分布的地域差距,强化了民众的艺术审美认同。民俗文化资源处于认同序列的底层,是认同度最低的资源类型。尽管民俗文化内容最为丰富,但差异性也最大。以民间信仰为例,有的神祇信仰其内容具有普适性,流传范围广,认同度高,如关公信仰、龙王信仰、土地信仰等,有的则仅在信仰产生地内部形成认同,只在特定地域传播,如山西晋东南的二仙信仰,陕西关中的太白山神信仰,河南桐柏、泌阳的盘古信仰等,民间信仰

背后关涉的是社会文化的交流互动以及民众的审美选择等多种因素。

### 三、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实践

资源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存在的用以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物力、财力、人力、能量、信息等客观存在形态的总和。文化资源是人们在从事物质生产和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凝结了人类劳动成果的、具有文化属性的各种资料。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孕育于黄河流域华夏民族生存的土壤,奠基于传统农业社会,是历代民众集体创造、传承的文化,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与民族特征。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谱系的构成从文化学的角度看包括民俗文化、民间文学、民间艺术;从存在形式可以划分为有形的物质文化资源与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认为,民间文化资源谱系的建构应该综合考量民间文化自身生成演进的内在规律和整个社会运行机制中各环节要素的关系,组成科学有序、动态发展的运行系统,具体包括民间文献资源、生态文化资源、农耕文化资源、制度规约资源、信仰庙会资源、民间文艺资源。乡村社会的转型发展植根于深厚的民间文化资源,而民间文化资源的核心是其巨大的文化价值,这种文化价值只有在新农村建设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资源成为文化产业、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才能焕发永久的生命力。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谱系建构既要注重资源的挖掘整理,更要追求现实针对性,通过实地调查、实证研究来检验学术预设的可行性。

#### (一)民间文献资源与活态文化的对接

民间文献是民众生活经历与创造智慧的印证,是历史信息的物质反映和存留,也是珍贵的民族文化财富。它记录了历代民众的社会生活,承载着民众的思想理念、价值标准、精神追求和审美风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山陕豫民间文献搜集整理的任务是,在已有辑录成果摸底分析的基础上,确立民间文献资料系统建立的原则,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意识文化、乡村文艺表演等层面,围绕农业文化、民间组织、民间信仰、民间文艺等专题,着眼于历代典籍、方志史料、碑刻文献、家谱族谱、村志村史、契约文书、民间表演、民间工艺等主

要文献类型与表现形态,建立民间文献资料系统。民间文献不同于官方记载的宏大叙事,而是一种在特定地域生长而成的地方性知识,保留了某一地域社会群体的文化记忆,其重要价值意义必须还原到实际语境和场域中才能被发掘,要在山陕豫乡村社会特定时空语境下重回现场,追踪调查,“找到文献的主人”,彰显民间文献搜集的地方感和现场感。山陕豫民间文献研究将以文化整体观为观照,在“跨省域社会文化共同体”视域下,进行跨区域、多类别民间文献资料整理,进行三地文献的汇总与编纂,形成内涵丰富、科学合理的民间文化资源体系。民间文献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时间性,是现在和过去的融合,我们不能单纯将其置于线性时间的过去,视作静态的、已然遗留,它体现着现在与过去交织的复杂性及深层的文化遗产关系。民间文献不是原封不动的、封闭静态的历史遗留物,而是不断变化的生命循环过程,我们要在乡村文化重建背景下,立足区域社会发展现实,探讨如何将民间文献的价值转化为民众的生活助力与精神需求,有选择、有侧重地探索民间文献的创造性转化路径,从学术资料、文化重构、社会建设三个层面完成民间文献资料体系构建与社会文化价值发现。

#### (二)村落生态智慧与美丽乡村建设

乡土村落景观是一个以家族村落为空间载体,将村落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有机结合的完整的复合性生态系统。它是人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生态文化,是乡土社会变迁的见证,蕴含着敬天重土、天人合一生态理念和历代乡村民众求生、求乐、求美的生存理想。村落紧紧依偎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根据地形地貌、山川的分布形成了山塬型、关隘型分散式村落和棋盘型、长龙型的密集式村落,村落选址遵循风水学背山、面水、向阳的原则,追求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和谐统一。山陕豫许多村落往往从周边山川走势着眼“依山建屋,傍水结村”,使聚落按照某种图案构筑,形成二龙戏珠、凤凰展翅、八卦呈祥等“意象”型村落。村落内部构成以神庙、祠堂等公共空间为中心,民居建筑由近到远依次排列,黄土高原村落老井、涝池是必需的公共设施。村落既是自然空间,也是礼制空间,还是美意空间,是千百

年来祖祖辈辈农民理想的栖息之地<sup>[17]</sup>。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乡村”两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概念,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中提出了“生态宜居”目标的实现,要破解乡村发展的难题,就是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则,努力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传统村落中汲取宝贵的生态智慧,一方面辩证分析村落景观中蕴含的等级观念、封闭保守意识、小农经济思想与当前新型开放的现代社会的不适应;另一方面从村落景观这一丰厚的文化遗产中透视民众的生存智慧,体味乡土村落景观中的血缘亲情、故乡真情、生活情态、田园情趣,让本地农民“看得见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让城里人“愿意来,留得下,过得好”,充分体现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创造性探索美丽乡村建设的模式。

### (三)农业生产经验与现代产业体系

村落是农业生产的空间场域,农业是村落延续的重要支柱,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即使是到了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仍有占总人口三分之四以上的四亿多农民生活在农村。在经济全球化、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人们遭遇到环境污染、土壤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多种难题,粮食安全成为各国实力竞争的重要指标。于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积累的农业智慧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国农业生产经验既体现在农民的生产实践中,也蕴藏在历代农书、农业谚语、乡土村志等文献或口头文本中,成为现代农业发展可资借鉴的资源。前者如农田耕种的休耕、轮耕、施农家肥、精耕细作、循环利用等经验,保证了农田越种越肥、旱涝保收;后者如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北魏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唐末韩鄂的《四时纂要》、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还有不见于正史的清代祁隽藻的《马首农谚》、丁锡奎《劝民种树俚语》,现代学者王毓瑚《秦晋农谚》,以及山陕豫各地乡土志、《民间谚语集成》等积累了宝贵的“地方性知识”,是难得的农业文献资料。乡村振兴的基础是产业兴旺,其内涵不仅指满足起码的生存需求,更重要的是提高质量,确保安全,主要举措有:第一,做强农业,实现绿色发展。由过去追求产量转向重视质量,加快农业转型升级,同时为了解决农业水源污染、土

壤污染问题,应有效控制化肥、农药、农膜的大量使用,真正推进农业的绿色发展。第二,发展产业,延长产业链。农业作为第一产业要做大做强,方可提高国际国内的竞争力,同时要推进农业的二产化、三产化,让原有的农业生产与收获之前的原料供应、科技服务对接,与收获之后的农产品加工、销售等环节挂钩,延长产业链,建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三大体系结合的现代农业体系。有条件的村子要由传统农业进一步拓展休闲、观光、体验、民宿等新兴产业,形成新业态。第三,改造小农户生产,实现农业规模化。传统农业模式是独门独户自产自销,分散经营,现代农业要求集约化、规模化,要引导农民发展专业合作社,探索生产合作新模式,走上农业发展的快车道。

### (四)民间组织习俗与乡村社会治理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国家权力只能延伸至县一级,而难以延及乡村,乡村的生产生活、社会秩序的维持全部依赖于家庭宗族、村落会社等民间组织,及其家法族规、村规民约等“不成文法”,达到社会控制之目的。家庭是每个社会成员的首属群体,每一位个体都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家族村落规范教育的过程中完成了社会化,家教重在引导,家规重在惩戒,家训则是把教育的内容用凝练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的警句、格言,一教一管,奖惩结合,有利于好的家风的形成。在山陕豫广大的乡村都有村规民约,它是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传统习俗惯制,河南陕县清代至民国年间许多村都制订了《五知条例》,把必须遵守的规范告知村民,并有“村执事”监督执行<sup>[18]</sup>。北宋时期著名学者吕大钧为其家乡制定的《吕氏乡约》,对乡民自身修养、家庭管理、结交朋友、处理人际关系诸多方面提出严格要求,在后世乡村治理中影响极大。山西晋东南乡村的村规民约一般刻于碑石,矗立在神庙或祠堂,让村民周知。在乡村邻里之间相互帮扶、患难与共、互助互救,形成了团结协作的民俗传统,其内容与方式主要是农忙时换工互助,红白喜事出资相助,村子公共设施倾力修建,成为世代延续的良风美俗<sup>[19]</sup>。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乡村治理既要依靠“法治”的外在式力量,更需要民间社会积累的乡村“自治”的内源性动

力,努力建构自治、德治、法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村规民约,在传统的村规民约里注入新时代的内涵,塑造村民的心灵世界,规范村民的社会行为,培育良好家风、文明乡风、淳朴民风。在实践上要树立典型,示范引路,通过评选“身边好人”“好媳妇、好婆婆、好妯娌”“星级文明户”,激励民众向上向善,比学赶超,促进乡风文明建设。

#### (五)民间信仰庙会与地域社会认同

民间信仰是在原始氏族宗教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基础上形成的,与特定地理环境、生产方式、民众心理结构相适应的多种神灵崇拜及其外化的行为表现。与正统文化相比较,它属于“潜文化”或“隐文化”,对民众的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产生巨大而又普遍的影响。民间信仰体系的构成有多种方式,按照官方认可程度及其扩布范围可以划分为:有皇帝敕封、官方认可、扩布广泛的正祀之神,有适应特定区域民众生产生活需求形成的常祀之神,还有仅仅流行在各文化亚区特定地域范围内的地方杂神。山陕豫民间信仰既有共同特征如对古老的神话传说中黄帝、炎帝、尧、舜、禹等神灵的崇拜,对土地神、龙王神的崇拜及普遍盛行的求雨习俗,也有因地理环境的差异、历史事件的影响、生存需求的不同,带来民间信仰的地域分异。庙会是以民间信仰为依托,以神诞庆典、仪式演剧、商品贸易为表现形态,综合了信仰、祭祀、商贸、游艺多种因素为一体的地域群体性交流活动。在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信仰庙会是不可或缺的民间文化资源,经过创新性发展,将会转化为地域文化、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可利用的资本。我们的思路是,第一,把信仰庙会整合进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谱系内,使之成为地域民间文化的重要标志。这些庙会既包括跨省、跨地域的黄帝、炎帝、大禹、关帝等庙会,也包括以历史地理为特点形成的两省多地民众参与的如陕北佳县白云山庙会,也有各省各地延续已久的庙会,如山西五台山庙会、陕西铜川市耀州区药王庙会、河南登封嵩山中岳庙会,以及各地大大小小的古会,如山西河曲县的古会名目就有“油灯会”“西瓜会”“祈雨会”“磨刀会”“人口会”等。第二,把庙会纳入地域经济市场流通的体

系内,使之成为地域经济交流的重要平台。施坚雅在对川西平原的经济运行考察之后,总结出以乡镇为中心的集市的聚集构成了基层市场,维系了当地社会秩序的稳定<sup>[20]</sup>。山陕豫乡村的基层市场不同于川西,是以一个村落或多个村落联合形成的庙会进而建构起来的公共场域,成为黄河中游乡村社会样态各异、功能一致的基层市场网络。庙会满足了各地民众的日常生活需求,如果政府大力支持,加以市场经济引导,既可以激活地方经济,又可以减少外部市场对村庄社会的冲击<sup>[21]</sup>,使农村经济更具有活力。第三,把信仰庙会放置在社会运行的机制之中,使之成为社会空间秩序建构的桥梁。乡村神庙大都建在村子中心,或跨县跨省风景瑰丽、交通便利的地方,以神灵信仰为纽带吸引着神庙所在地和周边民众参与,构成了各村社在神庙祭祀管理孰先孰后、孰多孰少的权力象征空间;庙宇神职人员、地方政府、普通信众管理庙宇的政治空间;以信仰的力量抚慰民众心灵,维护地域秩序的地域空间,民间信仰庙会正是具有多重空间、多种功能而备受学界各学科、社会各领域的关注。

#### (六)民间文艺展演与农民审美培育

民间文艺是历代民众集体创作、集体传承的文学艺术形式,主要分为三个系统:一是以神话、传说、故事为代表的口头叙事类;二是以戏剧、曲艺、民歌为主的表演艺术类;三是以器具、工艺、造型为表现形式的民间美术类。千百年来,乡村民众用口口相传的叙事类作品传承着民族记忆与地方历史,成为自娱自乐、教育后代的主要文学形式。更为普遍的是伴随着岁时节日、庙会集市、婚丧礼仪而上演的地方戏曲、民间说唱及民歌表演,常常出现摩肩接踵、人头攒动的观赏景象。民间器物就地取材满足了生产生活需求,民间剪纸、刺绣、年画装点美化了生活。正是这些艺术形态表达了民众最真实的思想情感,营造了色彩斑斓、有声有色的乡村世界。在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村人口大量向外流动,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也发生了变化,传统民间文艺的传承受到巨大冲击。如何挖掘乡村民间文艺资源,探索民间文艺创新发展的新模式,是一个必须回答的现实难题。我们的整体思

路是,构建“一点三线”的山陕豫民间文艺发展框架,抓好叙事讲述类、表演艺术类、器具工艺类三个民间文艺系统,探索民间文艺创新发展的可行性模式。第一,要修复民间文艺生态。将民间文艺还原到该区域特定的地理生态环境、社会历史背景中考察,建立容纳自然地理系统、社会历史系统、文艺自身系统在内的民间文艺生态语境。以山陕豫黄河金三角的三省四市民间文艺为核心点,抓住三条文化地理线,一条是黄河中游的上段以黄河为界的晋西、陕北民间文艺分布线,伞头秧歌、民歌、说书、小戏是其主要文艺形式;另一条是黄河中游中间地段的渭河、汾河流域民间文艺分布线,神话、传说、故事、山陕梆子戏、秦腔、道情、眉户戏深为民众喜闻乐见;还有一条是以太行山南段为连接点,在晋东南和豫西、豫中地区形成的民间文艺分布线,神话传说、民间戏曲、民间说唱闻名遐迩。第二,是将文献搜集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全面搜集地方方志、档案资料、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十套集成志书等资料,同时对三省民间艺术之乡、相关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建构完整的民间文艺资源谱系。第三,根据不同文化亚区民间艺术品类,探索可操作的民间文艺创新发展模式,如将艺术展演与乡村旅游相结合的“文旅融合”模式,将主流艺术、新媒体创作介入乡村的“艺术乡建”模式,利用传统民间艺术、民间工艺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文化产业”模式。让艺术回归民间,让农民成为艺术创作与欣赏的主体,乡村将更有魅力。

#### 四、结语

山陕豫民间文化源远流长,既相通互融,又各具特色。要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促进山陕豫区域经济合作的同时,挖掘民间文化资源,建构民间文化资源谱系,让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实现“山陕豫跨省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目标势在必行,这是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总结本土经验,重新发现乡村的价值,让民间文化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内源性动力,有利于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建设道路。民间文化资源谱系从宏观上涵盖两个大的方面:一是民间文化资源谱系内部各文

化要素、文化系统的关联性,内在特质与内部规律的研究;二是民间文化资源在整个社会运行机制里与其他社会要素诸如物质生产、社会制度、精神信仰、民间文艺等方面的关联性探索,在互动互构中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彰显民间文化的生命力。要盘活民间文化资源,必须坚持民间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眼光向下,回归民间,以农民为主体,在深入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探索民间文化资源发展的新模式,构筑起存续“文化记忆”,留住“乡愁”的精神家园。我们将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方法,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现文献资料整理与田野活态资料相互印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相对接,用具有针对性的学术成果为乡村振兴的伟大社会实践把脉发声,讲好黄河故事,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 注释:

- ①杨民康.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 ②路应昆.中国戏曲与社会诸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 ③张士闪.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鲁中四村考察[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
- ④季中扬.民间艺术的审美经验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 ⑤强东红.陕北民歌的审美维度与文化价值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⑥朱启臻.把根留住——基于乡村价值的乡村振兴[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9.
- ⑦潘鲁生.美在乡村[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9.
- ⑧参见:张庆熊.谱系与本质:生活世界的本体论[J].哲学分析,2016(6):4-5;王列生.作为一门常规科学的知识谱系学[J].甘肃社会科学,2018(4):141-151.
- ⑨林继富,王丹.解释民俗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19(20):4-10.
- [2]刘晓峰.我国乡土文化的特征及其转型[J].理论与现代

化, 2014(1):66-70.

[3]王璐璐. 新乡土伦理——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乡村伦理问题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8.

[4]陈佳贵, 等. 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 1995-2005年中国省域工业化水平评价与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19-20.

[5]陈锡文. 从农村改革四十年看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J]. 上海农村经济, 2018(8): 4-9.

[6]朱启臻. 把根留住——基于乡村价值的乡村振兴[M]. 北京: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19: 22.

[7]强东红. 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及其美学意义[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8(11): 174-181.

[8][德]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M]. 林荣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58.

[9]钟敬文. 话说民间文化[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0: 2.

[10][德]尼采. 论道德的谱系[M]. 周弘,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14.

[11]李晓林. 论福柯的考古学与谱系学[J]. 齐鲁学刊, 2001(2): 56-60.

[12]林继富. 民俗谱系解释学论纲[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2005(2): 47-48.

[13]冯天瑜. 地理环境与文化生成[N]. 文汇报, 1988-11-07(4).

[14]高翔. 丹纳的文艺生态学思想[J]. 社会科学辑刊, 1989(5): 127.

[15]汪安民. 文化研究关键词[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22.

[16]景天魁, 何健, 邓万春, 顾金土. 时空社会学: 理论和方法[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5.

[17]段友文. 黄河中下游家族村落民俗与社会现代化[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233-250.

[18]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河南省志·民俗志[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5: 247.

[19]段友文. 论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文化建设[J]. 山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7(8): 50-54.

[20][美]施坚雅.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 史建云, 徐秀丽,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89.

[21]李永萍, 杜鹏. 乡村庙会的社会整合功能及其实践特征——基于关中金村庙会的考察[J]. 湖北农业大学学报, 2016, 17(4): 49-54.

## The Genealogy Construction of Folk Cultural Resources of Shanxi, Shaanxi and Henan and the Rural Value Discovery

Duan Youwen

**Abstract:** As important birthplac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Shanxi, Shaanxi and Henan occupy a special position in the whole structure of Chinese social modernization, so they should demonstrate and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all provinces in Yellow River Basin and other provinces and regions in the state. The systematic in-depth sorting out of folk cultural resourc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genealogy are conducive to revealing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rural societies and paving a localized way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lk cultural resources include five categories of folk literature resources, material resources for production and living, folk organization resources, belief and temple fair resources and folk cultural arts resources. Only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new models of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folk cultural resources and promote the creation of "Cross-regional Social and Cultural Community of Shanxi, Shaanxi and Henan", can we tell a good story about Yellow River and realize the blueprint of building beautiful rural areas.

**Key words:** Shanxi-Shaanxi-Henan; empirical research; genealogy of folk cultural resources; innovative development